

# 三种中国形象： 大众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

程 勇

**内容提要** 大众文化的娱性文化逻辑建构了“狂欢中国”的形象，欲望叙事策略建构了“欲望中国”的形象，而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生产与传播则建构了奇观化的“文化中国”形象，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由于将“大众”误识为“人民大众”，将“欲望”等同于“民心”，以及将“市场化”中性化，我们对大众文化缺乏深刻的哲学反省和有针对性的文化批判，而制度匮乏和制度剩余的状况同时并存则使大众文化生产缺少有力的体制引导。朝向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大众文化实践应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理念和制度的规划，以建构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经验与认同符号的“和谐中国”形象为旨归。

**关键词** 大众文化 狂欢中国 欲望中国 文化中国 民族国家认同

程 勇，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310023

20世纪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坚实基础，以“醒狮”和“巨龙腾飞”为核心象征与文化想象，强有力地支撑了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巨大变革。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中国社会关系的重组，在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重建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使历史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大众文化领域，这种挑战既来自域外文化产品裹挟着的利益、理念，也来自本土文化实践体现出的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诉求，弱化甚至消解了20世纪中国对自身特征与标志的精神和制度建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以其“快适伦理”、“感性美学”的符号表意系统建构了三种“中国形象”，“大众”在“消费”这些“形象”的同时也据以“感知”和“想象”作为政治文化存在的“中国”，从而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对其进行哲学上的反省和文化上的批判，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性的课题。

—

就基本事实而言，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产品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萌生提供了最初的灵感和动力，从移植、复制进而寻求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大众文化精英”驰骋想象所依赖的依然是域外大众文化的范式。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一度被保守人士视作“洪水猛兽”，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文

---

本研究得到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编号:10YJA751014)的资助。

# 新时期生态写作中的自然科学话语

## ——兼论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现代化途径

李 玫

**内容提要** 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构成新时期生态写作的文本特质:符号层的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直接镶嵌;结构层的自然科学思维特征等。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建构了生态伦理的现代维度,以此实现中国文学中生态伦理由古典伦理(天人合一的诗性伦理)向现代伦理(突出历史发展中主体精神的理性伦理)的转向;在实践论层面,自然科学话语对民间伦理的佐证,推动了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进程。新时期生态写作以“敬畏自然”的科学态度和对理性的张扬与强调,实现对五四以来“科学”精神的对接与修正。

**关键词** 生态写作 自然科学话语 本土化 现代化

李 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10096

生态写作中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是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机缘密切相关的。“‘生态’这个概念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文学中生成,而是从生态科学、生态文明理论出发而转换过来的概念。”而“生态学对于‘生态’的界定,主要包涵了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以及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环境、生物所必需的生存条件。”<sup>[1]</sup>在从生态科学向生态文学转换的过程中,部分文本借鉴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话语特征和内在的逻辑思维,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坛的生态写作中具有较明显的自然科学话语特征。

自然科学话语进入生态写作叙事的符号层面,从符号代码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三种维度:其一是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的直接镶嵌对文本形态的影响;其二是自然科学的思维特征、研究方法对文体特征的影响;其三是自然科学认知推动生态写作中叙事模式、伦理立场的现代化、本土化。

### 一、自然科学话语:理性认知的文本特质

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专业知识、术语直接镶嵌入生态写作中,成为生态文学文本醒目的组成部分。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的感性、诗性的总体风格不同,具有自然科学话语特征的生态写作在文本构成上,通过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传达对自然、生命的认知。除“生物链”、“沙丘两翼之间的交角”、“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项目批准号:07CZW032)后期成果。

[1]徐肖楠:《生态文学的情感空间与审美意向》,《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 “怀旧”的城市诗学

## ——关于“苏州形象”的影像建构

曾一果 王 莉

**内容提要** 在今日的城市文化热中,人们多将目光对准上海、北京,但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历史名城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苏州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如何叙述和展现它?为何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影视媒介关于苏州形象的视觉再现,经常有一种浓厚的“怀旧色彩”?这些议题值得关注。本文试图对《小城之春》、《游园惊梦》、《橘子红了》和《凤穿牡丹》等影视媒介加以考察,探讨它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语境中建构一套“怀旧诗学”,并分析此“怀旧诗学”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如何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

**关键词** 城市文化 怀旧诗学 苏州形象 本土认同 全球化

曾一果,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 215123

王 莉,苏州大学 2010 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215123

### 引 言

近年来,上海城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显学,特别是大众媒介的老上海怀旧引发了李欧梵、张英进、孙玮等学者的关注,但是学术界对于上海身边的苏州——一座具有浓厚怀旧色彩的城市却没有给予太多注意。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两代,苏州可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之城,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繁华的古城,进入现代之后,它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等现代媒介如何叙述和展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发掘本土文化资源,重建城市自我认同已为新潮流。在此背景下,对苏州这样一座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城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现代大众传媒的视觉建构,世人可以深入体察传统城市面对变化世界的一种“复杂的情感”。

张英进说:“城市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呈现着迥然不同的形象。‘城’既可以指小镇,如县城或山城;亦可以指城墙,一种从小镇到故乡皆设有的防御式建筑。‘市’可以指市场(从小镇的农贸市场到都会的金融市场),亦可以指都市或都会。从形象角度看,城市的象征可以是小镇的一片城墙,一座孤塔,一

---

本文系 2011 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11TQC008)和 2011 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2011SJB860003)阶段性成果。

# 论 1930 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张立群

**内容提要**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30 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特定时代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本文从“捉住现实”的立场及其主题呈现、“为祖国而歌”的集中表达、“主题”的制约与形式的“选择”、“土地”等意象的意图外化、写作的转向与心灵的真实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努力在重绘 1930 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关键词** 1930 年代 新诗 国家主题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110036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人员 250014

历史地看,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诗经历草创期的实践,已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并呈现出深入发展的趋势,而在另一方面,30 年代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又使新诗必须做出回应。30 年代新诗的发展态势使其和“国家主题”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得益于主题学研究的启示,“国家主题”主要是研究“国家”这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处理,据以了解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意图’(intention)”<sup>[1]</sup>。具体至创作层面,“国家主题”不但包括与“国家”相关的题材、主题(此时主题的含义指单个作品)、母题、意象、情节、人物等,还包括与此相关的隐喻、象征以及理想、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国家主题的提出,可以以动态的视野重绘 30 年代新诗的图谱,而此时的 30 年代与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第二个十年(1927 至 1937 年)并不一致,又为其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

## 一、“捉住现实”的立场及其主题呈现

无论“1930 年代”的定位会最终为我们呈现怎样的研究视野,顺应 20 年代革命文学的发展,立足社会现实、捍卫革命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都是从历史演进角度谈及 30 年代诗歌国家主题首要面对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3 批面上资助课题“现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编号 2013M530328)的阶段成果。

[1]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2004 年版,第 26 页。

# 游民与越文化:《阿Q正传》的启示

张 克

**内容提要** 越文化在社会风俗出现高度流民化后会呈现如何溃败的情形,《阿Q正传》提供了绝好的文本。深谙越地优秀文史典籍传统的鲁迅选择沉潜至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的游民的精神世界,在越地风俗既狂热又麻木的精神底色里实施他的国民性批判,这其中的隐微着实耐人寻味。

**关键词** 游民 越文化 阿Q

张 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9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518055

关于鲁迅对越文化的承继,学人的探讨或依经起义,或文史互证,积累既丰,莹然之创见所在多有。即以《阿Q正传》而言,孕育其的越地风俗,经由周氏兄弟、周冠五、章川岛、孙伏园、裘士雄等人的细致疏解,业已眉目清晰。不过,在讨论“鲁迅与越文化”的关系时,《阿Q正传》的特殊之处依然显豁:鲁迅笔下阿Q生存的越地境遇,既少“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又无“勾践坚确慷慨之志”,一派“世俗递降”、“瘠弱槁枯”的溃败之像<sup>[1]</sup>,且别具令人心酸的戏谑感,这其实是越地社会风俗高度游民化的结果<sup>[2]</sup>。探究“鲁迅与越文化”,实不应回避这一触目的景象。在此意义上,《阿Q正传》提供了绝好的文本,因为它分明是描写了一个“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的游民。关于阿Q的“游民”性,不乏学人提及,《阿Q正传》的约稿人孙伏园在写于1948年的《〈呐喊〉索引》一文中就曾提出过阿Q是游民而非农民的论断——“阿Q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阿B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sup>[3]</sup>笔者拟以《阿Q正传》为中心尝试探讨,绍兴这样的越地小市镇的游民意识的泛滥是否是促成原本以农事为本、勤苦自立的越地“世俗递降”的重要因素?深谙越地优秀文史典籍传统的鲁迅为何有意无意之间会选择沉潜至文化资源极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11&ZD114)阶段性成果。

[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2]本文所指的“游民”取其宽泛义,指脱离原有社会宗法秩序,游食于城乡之间的人。更精确的辨析请参照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绪论。

[3]孙伏园:《〈呐喊〉索引》,[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



# 试论刘师培家学传统与扬州学派的关系

——由《江南乡试墨卷》说起

郭院林

**内容提要** 刘师培《江南乡试墨卷》四文表现出知识开阔、了悟四书之学、洞彻汉代史学、熟悉元代军事以及时政要闻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刘氏家学渊源与扬州学派之影响。刘氏四世传经,师培为扬州学派殿军人物。文章从学术传承与学术生态方面考察刘师培学术的现代转型,认为刘师培在传承与弘扬家学、扬州学派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学术实现了时代的突破,从而确定了刘师培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刘师培 家学 扬州学派 学术渊源 现代转型 江南乡试墨卷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25002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龠,江苏仪征人,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刘申叔)。他年齐才丰,以短暂的36年生命从学论政,留下了七十四部著作(另有未刊入其中的著述,今人万仕国辑有《刘申叔遗书补遗》)。这些著述不仅涉及经学、小学、校讎学等传统学术领域,而且还包括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政治、经济与教育,采取近代西方的学术方法与体系研究中国学术。刘师培在学术上是一个早慧的人,继承家学,汲取前贤,从而获有“少年国学大师”之誉。

1902年刘师培十九岁,于南京参加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江南乡试,中得第十三名经魁。这次乡试成为科举制度改革后策论的第一次实战,考试内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sup>[1]</sup>。刘师培墨卷文章为:一、《汉文帝减租除税而物力充羨,武帝算舟车、榷盐铁、置均输而耐用不足论》,二、《元初遣速不台、拔都等西征,其兵力之盛,直至斡罗息以西论》,三、《中外刑律互有异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损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四、《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sup>[2]</sup>。在第一篇艺文中,刘师培反驳了常人“皆以文帝为能藏富于民,而武帝不能藏富于民”的观点,提出“非必以寡

[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5页。

[2]刘师培《江南乡试墨卷》有刻本流传,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刘氏家刻线装本。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收入,〔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版。

# 从蝴蝶词与蟋蟀词 看宋代昆虫词的发展与蜕变

吴启安

**内容提要** 宋代吟咏昆虫的词作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宋词中涉及昆虫的词作很多,但单纯以一种昆虫为表现对象的词作却较少。《全宋词》中的蝴蝶词和蟋蟀词是出现较多的昆虫词,我们选取这两类词作,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文学意蕴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找寻宋代昆虫词的发展脉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言情”的词向“言志”的诗逐渐靠拢,词与诗不再有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完成了词作的开拓与蜕变,由此凸显宋代昆虫词在中国词史中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宋代 昆虫词 蝴蝶词 蟋蟀词 蜕变

吴启安,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464000

唐五代时期,词为“艳科”,花间词风盛行,风格多为绮靡恻艳。词至两宋,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从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上都有极大的改变。从《全宋词》中能粗略看出,由北宋至南宋,咏物词总体呈现逐步增高持续发展的趋势。清人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载:“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sup>[1]</sup>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也说:“夫咏物南宋最盛,亦南宋最工。”<sup>[2]</sup>其实,不仅是技巧,更多的是蒙上了词作者特有的意绪,而凸显了不同的格调。描绘昆虫的词,是咏物词的一种。昆虫,从现代学理上说,是动物界中无脊椎动物的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的动物,是世界上所有生物中种类及数量最多的一群,包括蝴蝶、蜂、蜻蜓、苍蝇、蚊子、蟑螂、蜈蚣、石蛾、蜉蝣、跳蚤、虱子等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昆虫多有记载,《太平广记》昆虫类收有昆虫七十种左右。宋词中对昆虫描写多有涉及。据“小荷作文网”中“唐诗宋词-全宋词-网络版”统计,在全宋词中,涉及写蝴蝶的有660条,写蜂的378条,写蝉的344条,写蛩的(主要指蝗虫,也叫蚱蜢,有时也指蟋蟀)156条,写萤的97条,写蚕的72条,写蝇的44条,写蟋蟀(包括促织)的12条,直接写蛾的不足10条,写蚊的9条,写蜻蜓的6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词的研读不难发现,宋词中涉及昆虫的词作虽然很多,但单纯直接以一种昆虫为表现对象的词作却较少。本文以《全宋词》中出现的蝴蝶词和蟋蟀词为切入点,探寻宋代昆虫词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词史中的意义和价值。之所以选取这两种昆虫,则是因为这两种生灵在全宋词中出现较多,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132400410011)阶段性成果。

[1][2]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75页,第3415页。